



降低招生中考试比重，增加考试中能力比重

——高考向何处去之我见

谢小庆

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23日题为“大学生新失业群体期待重视”的文章透露，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率大约为30%。据《南方日报》2005年7月19日报道，广州人才市场已经出现500元月薪招聘本科应届生的情况。这一工资水平不仅低于农民工，甚至低于广州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对于我这样一个与中国千年中形成的“应试文化”战斗了20余年的考试研究者来说，这些是最令我感到鼓舞的消息。从这些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报道中，我看到了高考改革的希望，也看到了在中国开展素质教育的希望。

一、 应试教育正在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

2005年5月在巴黎进行的中欧贸易谈判中，商务部长薄熙来曾说：“为了买回一架空中客车A380，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衣”。这句话，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难题。因此，在刚刚结束的16届5中全会上，“自主创新”成为核心话题之一。在《全会公报》中提到要“着力自主创新”，提到“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今天，中国对人类在科技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贡献，与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人的“聪明与勤劳”，并不相称。虽然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不能说与“学以应考、教以应考”的“应试教育”没有关系。这种“应试教育”，从童年起就挫伤了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素质，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如果不下决心通过高考改革来改变应试教育的局面，我们就很难走出目前这种“别人吃肉，我们喝汤”的局面，就很难改变目前这种“8亿件换1架”的局面，就只能在21世纪继续跟在英特尔、微软、朗讯、松下、索尼、夏普后面，喝一点残汤，吃一点剩饭。

二、 高考改革迟滞不前的原因在哪儿？

早在80年代初期，教育部就开始了传统高考的改革。在80年代中期，“片面追求升



学率”问题就曾经引起社会的重视，在《教育研究》杂志曾经长期开辟专栏进行讨论。9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问题引起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重视，“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25年过去，“应试教育”的局面非但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而且有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延伸的趋势。这种局面，很难说与25年来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改革的裹足不前没有关系。

任何进步和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对于主持美国“高考”SAT和研究生考试GRE的美国教育测验中心(ETS)来说，改革的风险是失败，不改革的风险是灭亡。对于我国的高考主管机构来说，改革存在风险，维持现状却没有风险。这种僵化的、缺乏动力的、缺乏优化机制的体制，是造成高考改革迟滞不前的主要因素。

不久前，杨振宁教授对媒体说，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则认为，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在下降。对此，新浪网和中国青年报在网上进行了一项联合调查（网址：<http://y.sina.com.cn/i/2005-08-17/155841880.html>）。截止到2005年10月24日，支持丘成桐的人占有投票者的90.72%，支持杨振宁的仅有2.17%，还有7.12%的人选择了“说不好”。对于“总的来说你觉得上大学值吗”的回答是，认为“值”的占57.15%，认为“不值”的占42.85%。我认为，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应试”主导下的今日中国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

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大声疾呼，希望教育主管官员们能够拿出更大的勇气，能够在改革高考方面步子迈得大一些。遗憾的是，由于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局限，我们这些呼吁所产生的作用甚微。今天，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已经将高考逼上了非改不可的道路。越来越多的贫困农民举债数万元支持子女读完大学以后，面对的却是子女“毕业即待业”。这时，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已不再是“高考改不改”的问题，而是“高考怎样改”的问题。我认为，高考改革的出路就是：在招生中，降低考试所占比重；在考试中，增加能力考查所占比重。

三、降低招生中的考试比重

现行招生考试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在学生评价方面最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没有任何发言权。作为一个心理测量学者，我深知，即使仅就能力评价而言，再好的考试也不如教师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更准确，更不用说非智力方面的评价。今天的情况是，对学生观察一年以至几年的中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升学没有任何发言权。相反，招生决策几乎完全依据在评价学生能力的有效性方面颇值怀疑的考试。要知道，比我国高考科学化程



度很高的能力考试SAT，在美国大学招生考虑中所占比重也不过30%左右。美国大学招生的主要考虑是高中成绩。

其次，将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高等学校的发言权也微乎其微，一般只能在具有同档分数的考生中进行选择。由于人的复杂性，在高等教育界存在不同的教育理念是很正常的。“语文水平对于研究物理是否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们的看法相去甚远。有人认为“很重要”，有人则认为“无所谓”。“英语水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是否重要？”对于这个问题，古汉语专家们的看法也相去甚远。有人认为“很重要”，有人则认为“无所谓”。对于这一类问题很难得到结论性的共识。今天，在大学新生的选拔中，校长和教师的教育理念基本不能得到体现。

第三，一些具有潜力的“专才”被拒之于高等学校之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今天，一些在某一方面表现出强烈兴趣和潜能但发展不够全面的学生，很容易由于分数未“上线”而被拒之于大学或一流大学之外。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是矛盾的。“世界冠军”大多发展不够全面。哪位真正关心自己学校发展的校长不希望自己的学校中多出几个“世界冠军”呢？今天，多少校长有权力将这样一些潜在的、不够全面的“世界冠军”招进自己的学校呢？

已往，这种不合理的招生考试制度是我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在招生中能给高中和大学发言权吗？不能。一旦给了发言权，这种权力就很容易被滥用并导致社会公平的丧失。于是，我们只好将全部权力赋予在能力评价方面有效性并不高的考试，并承担其带来的“应试教育”恶果。否则，无法维护社会公平。其实，我们曾经努力维护的那种社会公平也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教育条件相差甚远的北京考生和大别山区的考生，即使以同样分数录取，都很难说是公平，以往的实际情况却是相反，后者的录取分数线反而高出前者许多。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呢？之所以不能给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发言权，是由于缺乏对权力使用的制约机制。之所以缺乏制约机制，是由于没有人真正关心大学新生的质量。通常，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家不会轻易将原料的采购权交给企业以外的人，因为原料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但是，在许多年中，我国的大学校长们对这种基本放弃招生权力的状况却泰然处之。“原料”的好坏，“产品”的好坏，与校长的利益没有多大的相关。多数大学校长们的境遇是：既没有多大权力，没有多大责任和利益。没有聘用、解聘的用人权，没有奖罚的财权，也没有“采购原料”的招生权。因此，也基本不承担什么责任，只要不出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就可以继续当校长。大学校长合法的利益微乎其微，廉洁的大学校长几乎算不上“中产阶级”。

造成这种不合理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人对高校的办学质量承担责任。于是，在许多高校中，不仅没有人关心“原料（新生）”质量，甚至没有人真正关心“生产过程（教学）”



和“产品（毕业生）”质量。

可喜的是，伴随“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一些校长已经感到了压力。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关注“原料采购”，需要改变这种“原料采购”大权旁落的现象。校长们的这种变化使招生制度获得了动力，使招生制度改革成为可能。

解决应试教育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革现有招生体制。招生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降低考试在招生决策中的比重。为此，需要将招生权还给大学。多大程度上考虑考试成绩？考虑哪些科目的考试成绩？在考试成绩之外考虑哪些因素？这些应该是大学的权力。为此，需要给高中教师发言权，依靠高中教师对学生长期的、多角度的、综合性的观察来进行评价。要由大学来保证高中教师正当使用自己的发言权，制约高中教师的只能是具有招生权力的大学。这方面，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一直认为，承担责任的大学校长们争得招生权之日，就是“应试教育”寿终正寝之时。在现阶段，招生权可以包括：一，加试权。允许各个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思想，在高考之外增加自己选择的能力考试或面试。二，签约权。允许各个高校与一些自己认为教育思想端正的中学签订“供需合同”，接收免试保送生。三，自主权。允许高校破格录用一些对某一领域表现出特殊兴趣和潜能的学生。

四、 一个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的方案

必须改变中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升学没有发言权的局面。为此，我强烈向各省的教育主管官员推荐一种改革方案：以高中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依据，以统一考试作为高中成绩的校正因子，统一考试成绩与考生脱钩。具体的做法是：在进行全省或全国统一考试以前，将所有应届考生的高中成绩上报存档。统一考试以后，根据统一考试的成绩，以学校为单位，对各个学校的高中成绩进行校准，校准为具有可比性的“校准高中成绩”，提供给高校。高校根据“校准高中成绩”录取新生。每个考生在统一考试中的成绩将成为国家机密，严格保密，完全与考生脱钩。面对社会仅仅公布各个学校的统一考试平均成绩。用教育测量学的术语说，就是以统一考试作为“外部共同题”或“外徇”，对各个学校的高中成绩进行等值，以经过等值的“校准高中成绩”作为大学招收新生的参考依据。

各个学校在统一考试前上报存档的高中成绩不仅仅是期终的笔试成绩，而是一个包含平时成绩和教师主观评价在内的综合性成绩。

这一方案的优点包括：首先，给了最应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必要的发言权；其次，以长期的“形成性评价”取代了一次性的“终结性评价”；第三，以“笔试和面试相结合”

的评价取代了单纯笔试的评价；第四，在保证评价效度的基础上，兼顾到测验的信度和可比性。

我殷切地期望有关教育主管部门认真考虑这一方案。

五、 增加考试中的能力比重

长期以来，重视知识传授而忽视能力培养是我国教育的痼疾，这与考试的导向作用无关系。

在心理学中，能力和知识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能力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对于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古人早就做出了非常清楚的回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送给别人一些鱼，不如教给别人一些打鱼的方法。鱼，就是知识；渔，就是能力。知识性考试，就是看一个人篓子里有多少鱼；能力性考试，就是让人打两网鱼看看，看其渔之高下。

“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首先，二者的影响面不同。知识仅仅影响到一个人在有限领域中的活动，例如，光学知识仅仅影响一个人解决有关光学方面的问题，对他在其他方面的活动影响并不大；能力则影响到人在较广领域中的活动，例如，逻辑推理能力影响到一个人的多种活动，影响到一个人治学、经商、从政等许多方面的活动。其次，二者的变化速度不同。相对来说，知识是一种“快变量”，既可能通过强化训练而获得，也可能由于遗忘而失去。能力则是一种“慢变量”，能力的形成过程恰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三，二者的变化方向不同。能力的变化基本是单向的，只增长，不减少。在衰老之前，能力呈单向增长的变化趋势。知识则不同，可能增加，也可能由于遗忘而减少。

能力考试与知识考试也是有区别的。能力性考试主要考察那些影响活动较广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知识性考试主要考察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内容，如字词知识、光学知识，等等。能力考试的主要特点包括：首先，不容易受到强化辅导的影响，几乎是无法突击准备的。其次，对记忆力的要求较低，侧重考查言语运用能力、计算能力、判断推理能力等。第三，不与某一特定教材挂钩。

究竟什么是能力？简单讲，主要是推理能力。“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教一知一，教二知二，就是掌握了知识。从一可知二，从二可知三，就是学会了推理，就是具备了能力。几乎进行所有的活动都需要推理能力。阅读理解、数学证明、著书立说，等等，都需要推理。

在高考中如何加强能力考查？这一直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关注的问题，对于在高考中加



强能力考查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怎样加强能力考查却有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比较大胆、比较激进的思路，即增加能力考试的思路。这种思路主要是受到SAT和GRE启发。美国的高考——学习评价测验（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SAT）包括SAT I和SAT II。SAT I是一个能力考试，包括言语和数量两个部分，实际是言语推理和数量推理。虽然是用于大学招生，涉及的知识却很有限，基本是初中阶段的知识。SAT II是一组知识考试，包括英语（语文）、数学、法语等十几个学科考试。美国的多数大学仅要求SAT I成绩，只有一些著名学校的某些系、科要求一到两门SAT II的成绩。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水平考试（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简称GRE）包括“GRE普通”和“GRE学科考试”两部分。“GRE普通”是一个能力考试，包括言语、数量和分析性写作三个部分。“GRE学科考试”包括英语（语文）、数学、物理等多种学科考试。美国的多数大学仅要求“GRE普通”成绩，只有一些著名学校的某些系、科要求一到两门“GRE学科考试”的成绩。教育部考试中心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种思路，在“七五”、“八五”期间，“能力考试”都是原教委考试中心的重要研究课题，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分别组织了两个课题组，不仅对美国的SAT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且编制了几个不同的学习能力考试试卷，并对高中生、大学生进行了试测。（研究结果见教育部考试中心编的《能力考试的研究与实践》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种思路的突出特点是：考试与教材脱钩。

另一种是在现有考试中加强能力考察的思路，这是一种比较保守、比较稳健的思路。正在推行的“3+X”改革方案即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在这种“3+X”模式中并不包括能力考试，都是学科知识考试。这种思路的突出特点是：考试与教材挂钩。

长期以来，教育部采取了后一种保守的改革思路。正是由于一直采用这种保守的思路，“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与教育部的保守思路不同，中组部、人事部在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改革中迈出了更快的脚步。从1989年开始，人事部就在政府工作人员录用考试中引入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个考试包括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和资料分析5个部分，主要通过言语、数量、常识、图表等不同方式考查报考者的推理能力。最初，“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在笔试中仅占10%的比重，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法律、行政学等知识内容的“公共基础知识”占90%的比重。1992年以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比重增加到50%。2002年，在中央机关的录用考试中取消了“公共基础知识”考试。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负责人解释取消“公共基础知识”考试的原因时说：“这个考试很难避免考生凭背一本考试指定用书应付考试的情况，很难避免考试中考查记忆成分过大的情况。”从近10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国家人事部大胆的考试改革尝试得到了考生、用人单位和各级人事部门的认可，对提高政



府机构人员素质和办事效率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高考改革中，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增加考试中的能力比重，增加对推理能力的考查，降低知识的比重，降低对记忆力的考查比重。高考需要尽快与教材脱钩。我期待着在教育领域中早日出现类似SAT、GRE、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类的能力考试。

六、立字当头，渐立渐破

以往的一种说法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20多年来许多领域的改革经验却是相反：立字当头，新旧并存，逐渐实现以新破旧，以新代旧。

在考试改革方面，中组部、人事部引入“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过程就是一个“先立后破、渐立渐破”的成功范例。从1989年的10%开始，逐渐提高能力考试在公务员录用中的比重。在经过了13年的实践和比较之后。2002年最终在中央机关录用考试中取消了“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教育部门借鉴和思考。

在引入能力考试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已经在“立”的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应对“应试型考生在研究生考试中占优势”的局面，在2005年心理学院的研究生复试中，加试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持开发的“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简称ZHC，是职业汉语测试的汉语拼音缩写）。（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4日头版，《人民日报》2005年4月13日第11版）与“行政职业能力”考试类似，ZHC也是一个能力性的考试。日前，为了在“保研”的过程中加强能力考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又对将于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进行了ZHC专场测试。ZHC成绩将成为2006年保送研究生选拔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我希望有关教育主管官员能够借鉴中组部、人事部、北京师范大学的作法，在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中逐渐引入能力考试。开始，可以仅仅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总成绩。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增加比重。

七、必要的代价

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给大学校长招生权，是今天高考改革的主要方向。在今天普遍社会风气令人沮丧的情况下，高中教师和大学校长能否正当地行使这些权力，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首先，由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突显，必要的制约机制正在逐渐形成。以往那种权力不受制约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

其次，需要相信大多数。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



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高中教师和大学校长的胸中都跳动着一颗向往高尚生活的心。

第三，任何进步都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容忍一些腐败，容忍一些贪官污吏、豪门权贵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是为了发展素质教育不得不付的代价。生活中所面临的抉择很少是“选择最佳”，通常都是“避免最坏”。为了保护几代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了争取21世纪中国的发展机会，容忍一些腐败是值得的。

八、“先行”还是“跟进”

中国改革面临的是一个“环形制约”：政治发展制约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制约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制约社会文化发展，社会文化发展又制约政治发展。在这个制约链条中，没有“关键环节”，不可能有“革命”或“突破”。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突飞猛进”，只能是以“蚕食”、“蠕动”、“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在这种局面中，某一个领域如果先行一步，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付出更大的代价，遭遇更多的伤亡。如果谁也不愿做先行者并为之付出代价，改革的步伐就只能放慢。

长期以来，教育领域就一直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跟进者”的角色。这种角色虽然使教育官员们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性和更平稳的仕途，却使教育领域对中国改革的进程贡献较小。

1989年初，我曾当面对当时分管教育的政治局委员讲：今天，发展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取消包分配”。“包分配”是迟早要取消的，或者自己主动取消，加速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或者伴随《企业法》和《公务员条例》的逐步落实而被动地取消。

16年过去了，“包分配”最终被动地取消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部扮演了“跟进者”的角色。可以设想，16年前的教育主管领导如果选择了“先行者”的角色，他将承担大得多的改革风险，他也可能对中国的改革做出大得多的贡献，使中国的教育至少早10年走出“应试教育”的阴影。

“先行”还是“跟进”，今天的教育主管官员们仍然面临着选择。不同的选择。将使他们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不同的足迹，也将赋予他们的人生非常不同的意义。

九、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尚不是“减肥”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降低能力考查比重、增加知识考查比重”是美国教育界和教育测量学界的主要呼声。2001年由小布什政府启动的、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的一个



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考试”，尤其是加强对知识的考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能力测验首先在美国军队中广泛使用。二战中几百万人参加了用于安置新兵的能力测验。能力测验SAT从1926年开始就应用于美国的大学招生。对能力考查的强调使美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保持了科技领先的地位，使美国至今在大多数科技领域中走在世界前列，使美国至今掌握着世界上多数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专利。到上个世纪末期。美国在“强调能力”方面确实走过了头，使学校教育出现了忽视知识积累的倾向。对此，美国教育界开始纠偏。

中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注重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发展”。中国教育尚远远没有走出“应试教育”的泥沼。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是“穷人脂肪摄入量过高”。在美国，如果根据一个人的臃肿体态来猜测其不佳的经济状态，大致不会出错。在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还存在“穷人脂肪摄入量不足”的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美国非常不同，不能因美国在“加强知识考查”而放松我们自己“加强能力考查”的步伐。

参考文献

- 谢小庆（1998）迟滞考试科学化的症结在哪儿，光明日报，1998-6-10
- 谢小庆（1998）改革高校招生体制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北京观察，1998年9期
- 谢小庆（2003）考试应该体现谁的意志，湖北招生考试，2003-10（下）
- 谢小庆（2004）必须认真清理考试领域中不合理的行政许可，湖北招生考试，2004-12（下）
- 谢小庆（2004）高校自主招生不可缓行，中国青年报，2004-11-3
- 谢小庆（2005）探索更合理的研究生招考制度，中国青年报，2005-7-5

（此文已经发表在《湖北招生考试》2005年第10期[下]）